

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

主编
陈众议



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

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

Estudios sobre la historia de estudios cervantinos

陈众议 著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陈从以



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

Estudios sobre la historia de estudios cervantinos

陈众议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 / 陈众议著.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 9

(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 / 陈众议主编)

ISBN 978-7-5447-5020-2

I. ①塞… II. ①陈… III. ①塞万提斯, M. D. (1547~1616)—人物研究 ②塞万提斯, M. D. (1547~1616)—文学研究 IV. ①K835.515.6 ②I551.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09239 号

书 名	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
作 者	陈众议
责任编辑	王理行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3.5
插 页	4
字 数	320 千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5020-2
定 价	58.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联系电话: 025-83658316)

总序

在众多现代学科中,有一门过程学。在各种过程研究中,有一种新兴技术叫生物过程技术,它的任务是用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对生物有机体进行不同层次的定向研究,以求人工控制和操作生命过程,兼而塑造新的物种、新的生命。文学研究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过程研究,从作家的创作过程到读者的接受过程,而作品则是其最为重要的介质或对象。问题是,生物有机体虽活犹死,盖因细胞的每一次裂变即意味着一次死亡;而文学作品却往往虽死犹活,因为莎士比亚是“说不尽”的,“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

换言之,文学经典的产生往往建立在对以往经典的传承、翻新乃至反动(或几者兼有之)的基础之上。传承和翻新不必说,即使反动,也每每无损以往作品的生命力,反而能使它们获得某种新生。这就使得文学不仅迥异于科学,而且迥异于它的近亲——历史。套用阿瑞提的话说,如果没有哥伦布,迟早会有人发现美洲;如果伽利略没有发现太阳黑子,也总会有人发现。同样,历史可以重写,也不断地在重写,用克罗齐的话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但是,如果没有莎士比亚,又会有谁来创作《哈姆雷特》呢?有了《哈姆雷特》,又会有谁来重写它呢?即使有人重写,他们缘何不仅无损于莎士比亚的光辉,反而能使他获得新生,甚至更加辉煌灿烂呢?

这自然是由文学的特殊性所决定的,盖因文学是加法,是并存,是无数“这一个”之和。鲁迅谓文学最不势利,马克思关于古希腊神话的“童年说”和“武库说”更是众所周知。同时,文学是各民族的认知、价值、

情感、审美和语言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体现。因此,文学既是民族文化及民族向心力、认同感的重要基础,也是使之立于世界之林而不轻易被同化的鲜活基因。也就是说,大到世界观,小到生活习俗,文学在各民族文化中起到了染色体的功用。独特的染色体保证了各民族在共通或相似的物质文明进程中保持着不断变化却又不可淹没的个性。惟其如此,世界文学和文化生态才丰富多彩,也才需要东西南北的相互交流和借鉴。同时,古今中外,文学终究是一时一地人心的艺术呈现,建立在无数个人基础之上,并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表达与传递、塑造与擢升着各民族活的灵魂。这正是文学不可或缺、无可取代的永久价值与恒久魅力之所在。

于是,文学犹如生活本身,是一篇亘古而来、今犹未竟的大文章。

此外,较之于创作,文学研究则更具有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属性,因而更取决于生产力和社会形态、社会发展水平。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之一。如是,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研究起步较晚,外国文学研究更是如此。虽然以鲁迅为旗手的新文学运动十分重视外国文学,但从实际成果看,1949年前的外国文学研究却基本上属于旁批眉注、前言后记式的简单介绍,既不系统,也不深入。因此,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几乎可以说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全面展开的,而系统的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这还是第一次。

—

学术史研究也是一种过程学,而且是一种相对纯粹的过程学。不具备一定的学术史视野,哪怕是潜在的学术史视野,任何经典作家作品研究几乎都是不能想象的。

然而,后现代主义解构的结果是绝对的相对性取代了相对的绝对性。于是,许多人不屑于相对客观的学术史研究而热衷于空洞的理论了。在有些人眼里,甚至连相对客观的真理观也消释殆尽了。于是,过去

的“一里不同俗，十里言语殊”，成了如今的言人人殊。于是，众生喧哗，且言必称狂欢，言必称多元，言必称虚拟和不确定。这对谁最有利呢？也许是跨国资本吧。无论解构主义者初衷如何，解构风潮的实际效果是：不仅相当程度上消解了真善美与假恶丑的界限，甚至对国家意识形态，至少是某些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民族凝聚力都构成了威胁。然而，所谓的“文明冲突”归根结底是利益冲突，而“人权高于主权”这样的时鲜谬论也只有在跨国公司时代才可能产生。

且说经典在后现代语境中首当其冲，成为解构对象，它们不是被迫“淡出”，便是横遭肢解。所谓的文学终结论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它与其说指向创作实际，毋宁说是指向传统认知、价值和审美取向的全方位的颠覆。因此，经典的重构多少具有拨乱反正的意义。

正是基于上述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于2004年着手设计“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工程”计划，并于翌年将该计划列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十一五规划”。这是一项向着重构的整合工程，它的应运而生，标志着外文所在原有的“三套丛书”（即20世纪60至90年代——“文革”时期中断——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等工作的基础上又迈出了新的一步，也意味着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已开始对解构风潮之后的学术相对化、碎片化和虚无化进行较为系统的清算。

于是，关乎经典的一系列问题将在这一系统工程中被重新提出。比如，何为经典？经典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经典重在表现人类的永恒矛盾（用钱锺书的话说是“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呢，还是主要指向时代社会的现实矛盾？它们在认知方式、价值判断、审美取向方面有何特征？经典及经典批评与时代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关系何如？批评及批评家的作用（包括其立场、观点、方法及其与时代社会的一般和特殊关系）又如何？此外，经典作家的遭际与性情、阅历与禀赋，经典的内容与形式、继承与创新，以及文学的一般规律和文学经典的特殊性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将是本工程需要展示并探讨的。

且说世界文学一路走来,其规律并非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童年的神话、少年的史诗、青年的戏剧、中年的小说、老年的传记是一种概括。由高向低、由外而内、由强至弱、由大到小等等,也不失为一种轨辙。如是,文学从摹仿到独白、从反映到窥隐、从典型到畸形、从审美到审丑、从载道到自慰、从崇高到渺小、从庄严到调笑……终于一头扎进了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死胡同。小我取代了大我,观念取代了情节;“阿基琉斯的愤怒”变成了麦田里的脏话;“路漫漫兮其修远,吾将上下而求索”变成了“我做的馅饼是世界上最好吃的”;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是谓下现实主义。当然,这不能涵盖文学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事实上,认知与价值、审美与方法等等的背反或迎合、持守或规避所在皆是。况且,无论“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经典是说不尽的,这也是由时代社会及经典本身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所生发的。

众所周知,文学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向来重视文学,尤其是经典作家在反映和揭示社会本质方面的作用。马克思在分析英国社会时就曾指出,英国现实主义作家“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恩格斯也说,他从巴尔扎克那里学到的东西,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列宁则干脆地称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这并不是说只有文学才能揭示真理,而是说伟大作家所描绘的生活、所表现的情感、所刻画的人物往往不同于一般抽象的概括、数据的统计。文学更加具体、更加逼真,因而也更加感人、更加传神。其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载道与传道功能更不待言。站在世纪的高度和民族立场上重新审视外国文学,梳理其经典,展开研究之研究,将不仅有助于我们把握世界文明的律动和了解不同民族的个性,而且有利于深化中外文化交流,从而为我们借鉴和

吸收优秀文明成果、为中国文学及文化的发展提供有益的“他山之石”。胡锦涛前不久说过,“我们必须准确把握当代世界和中国发展变化的大势,坚持立足国情,同时又吸收世界文化的优秀成果;坚持立足当代,同时又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统”。这和“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思想一脉相承。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学作为人文精神的重要基础和介质,既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见证,同时也是一时一地人心、民心的最深刻、最具体的体现,而外国文学则是建立在外国各民族无数作家基础上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认识观、价值观和审美观的形象反映。研究人心自然不能停留在简单抽象的理念上,因此,走进经典永远是了解此时此地、彼时彼地人心、民心的最佳途径。换言之,文学创作及其研究指向各民族变化着的活的灵魂,而其中的经典(包括其经典化或非经典化过程)恰恰是这些变化着的活的灵魂的集中体现。

如是,“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立足国情,立足当代,从我出发,以我为主,瞄准外国文学经典作家作品和思潮流派,进行历时和共时的梳理。其中第一、第二系列由十六部学术史研究专著、十六部配套译著组成:第一系列涉及塞万提斯、歌德、雨果、左拉、庞德、高尔基、肖洛霍夫和海明威;第二系列包括普希金、茨维塔耶娃、康拉德、狄更斯、哈代、菲茨杰拉德、索尔·贝娄和芥川龙之介。

三

格物致知,信而有证;厘清源流,以利甄别。“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中的经典作家作品学术史研究系列,顾名思义都是学术史研究(或谓研究之研究)。学术史研究既是对一般博士论文的基本要求,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文学研究方法,更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文化积累工程,同时还可以杜绝有关领域的低水平重复。每一部学术史研究著作通过尽可能竭泽而渔式的梳理,即使不能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至少也能老实实在地

将有关作家作品的研究成果(包括有关研究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公之于众,以裨来者考。如能温故知新,有所创建,则读者幸甚,学界幸甚。相配套的经典论文翻译,则遴选有关作家作品研究的阶段性和标志性成果,其形式类似于外文所先前出版的“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

此次面世的“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中的每一部学术史研究著作将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经典作家(作品)的学术史梳理。这是相对客观的,但其中的艰难也不可小觑。首先,学术史梳理既不像平素泛舟书海,拾贝书海,尽意兴而为之的俯拾由己和随心所欲;其次,牵涉语种繁多,而且经过20世纪的形形色色的方法论和批评思潮的浸染,用汗牛充栋来形容经典作家作品研究成果已不为过。因此,要在浩如烟海的研究史料中攫取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和方法,实在是件考验耐心和毅力的事情。战战兢兢,生怕挂一漏万,自不待言,且挂一漏万在所难免。因此,我们只能择要概述,甚至把侧重点放在经典作家的代表作上。不然纵使篇幅再大,也难以涵括浩瀚的文献资料。换言之,去芜杂的枝蔓和重复的敷衍,留精粹要义和真知灼见是必然的,但也是不容易做到的。它考验我们涉猎的深度和广度,而且也是检验我们学术水准和价值判断的重要环节。

第二部分研究之研究何啻是一大考验。都说20世纪是批评的世纪,在经历了现代主义的标新立异和后现代主义的解构风潮之后,在各种思潮、各种方法杂然纷呈的情况下,如何言之有物、言之成理、不炒冷饭,殊是不易;如何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前进,就更是难上加难。反过来看,正因为文化相对主义的盛行和批评的多元,也才有了我们展示立场、发表见解的特殊理由和广阔余地。举个简单的例子,解构主义针对二元论的颠覆虽然是形而上学的,却不可谓不彻底。其结果是相当一部分学者怀疑甚至放弃了二元思维,但事实上,二元思维不仅难以消解,而且在可以想见的未来仍将是人类思维的主要方法。真假、善恶、美丑、你我、男女、东方和西方等等实际存在,并将继续存在。与此同时,作为中国学者,面对西方话语,我们并非无话可说。总之,从文学出

发,关心小我与大我、外力与内因、形式与内容、反映与想象、情节与观念,以至于物质与精神、肉体与灵魂、西方与东方等诸如此类的二元问题,以及经典在民族和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依然可以是我们的着力点。当然,二元论决不是排中律,而是在辩证法的基础上融会二元关系及二元之间所蕴藏的丰富内涵和无限可能性。毋庸讳言,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解放思想,广开言路,但日新月异中不乏矫枉过正、时髦是趋。比如大到存在与意识、物质与精神的辩证关系,小到客观与主观、客体与主体等等,都大有乾坤倒转、黑洞化吸之势。至于意识形态“淡化”之后,跨国资本主义的一元化意识形态更是有增无已;真假不辨、善恶不论、美丑混淆的现象所在皆是;个人主义大行其道,从而使抽象的人性淹没了社会性;普世主义势不可挡,以致文化相对主义甚嚣尘上。文学从大我到小我,从外向到内倾,从摹仿到虚拟,从代言到众声喧哗;真实给虚幻让步,艺术向资本低头;对妖魔鬼怪和封建迷信津津乐道,任帝王将相和无厘头充斥视阈,能不发人深省?然而,经典作家是说不尽的,以上的任何一位作家都是无法穷尽的。用巴尔加斯·略萨的话说,伟大的经典具有“自我翻新”的本领。至于何为经典,虽然也是个说不尽的话题,但用简单的方式综观前人的观点,也许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一是它们必须体现时代社会(及民族)的最高认知和一般价值(包括人类永恒的主题、永恒的矛盾);二是其方法的魅力及审美的高度不会随着岁月的更迭而褪色或销蚀。当然这是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一种说法。而本课题便是关乎经典其所以成为经典的一种较为复杂的论证方式。需要说明的是,经典不等于市场。用桑塔亚那的话说,经典不在于一时一地喜欢者的多寡,而在于喜欢者的喜欢程度。如果在此基础上再加上一个历史的维度,那么这话也就更加全面了。

学术史研究的最后部分为文献目录。它在尽可能详尽的基础上,还要有所选择。不然,展示一个经典作家的学术史,光文献目录就可以编辑厚厚的几大本。因此,去粗存精,是为重要或主要文献目录。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的中长期目标是在作

家作品和流派思潮研究的同时,进行更具问题意识的学术史乃至学科史研究,以期点面结合,庶乎“既见树木,又见森林”;若能密切联系实际,促进中华学术的繁荣、发展和创新,则读者幸甚,我等幸甚。无疑,此工程面向全国高校及科研机构,希望有志于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的同仁踊跃加盟、不吝赐教。

陈众议

2009年10月于北京

绪言

一如任何经典作家的学术史,塞万提斯研究汪洋恣肆、了无边际。为避免被浩瀚的资料所淹没,本著仅仅撷取了塞万提斯学术史中最为突出的冰山一角,而这一角便是作为绝对中心的《堂吉珂德》研究。然而,即便如此,也只能披沙拣金,取精用宏;顾此失彼、挂一漏万则是在所难免的。此外,学术史梳理,无论多么简单、客观,也会有意无意地沾染上研究者的色彩。这色彩既有意识形态属性,也不可避免地体现了研究者的视野和学识、性情和偏好。因此,即使笔者恪尽职守,努力做到不偏不倚、客观公允,但事实是,绝对的客观和全面是不存在的。

至于本篇所要展示的研究部分,自然无法涵括整个塞学中的诸多问题,甚至是其中的主要问题;盖因四百年塞万提斯研究如汗牛充栋,成果之繁博,所涉之深广岂是区区一部专著可以一网打尽。况且“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文学也都是当代文学,站在时代的高度,背靠民族文化,塞万提斯无疑也是说不尽的。如是,这无论如何都只是我国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的一个粗陋的开端。也就是说,本著充其量只能算部分学术史研究或研究之研究,甚至只是笔者塞万提斯研究的一个方面,但毕竟是相对主观的一面,故而更有丑媳妇见公婆的忐忑与羞惭。但是,这种抛砖引玉,无疑是学术发展的重要环节。谓予不信,本人不妨略述如下:

在历时四个多世纪的塞万提斯研究中,《堂吉珂德》始终是无可争辩的中心。尤其是在17至18世纪,所谓塞万提斯研究,如果称得上研究的话,也只是《堂吉珂德》研究。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真正为《堂吉

《堂吉珂德》研究鸣锣开道的,是19世纪的浪漫主义。海涅、拜伦等一大批浪漫主义者“拨乱反正”,奉塞万提斯或堂吉珂德为一尊,甚至干脆将自己“等同于”哭丧着脸的游侠骑士。他们的许多观点至今仍萦绕在我们耳边。

然而,正所谓时移世易,时代有所偏侧,19世纪的宏大叙事在20世纪的解构风潮中变得破碎、模糊。于是,反思和重构成了当务之急。于是17至18世纪的那些不是研究的研究逐渐浮出水面,并多少为我们显示了最初的解读。无论如何,从现代接受美学的角度看,它们不仅是有效的,而且为后来的追根溯源、探赜索隐奠定了基础。

最初的接受主要是嘘声和笑声。嘘声来自同时代文人,其中洛佩的判决奠定了塞学最初的负面基调。笑声是一般读者给予塞万提斯的回报。他们不是在堂吉珂德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并和他同命运共欢乐,便是视他为十足的疯子、逗笑的活宝。18世纪是个理性的世纪、启蒙的世纪、新古典主义的世纪,但塞万提斯及其《堂吉珂德》继续面临不同,甚至完全对立的接受与评价。如果说英国翻译家彼得·莫特开启了18世纪正面评价和肯定《堂吉珂德》的先声,那么法国译者阿兰-热内·勒萨热恰好从反面否定了塞万提斯和《堂吉珂德》。后者不仅翻译了阿维利亚内达的伪作,而且在《译者前言》中猛烈地抨击了塞万提斯。因此,塞万提斯必得等到19世纪的浪漫主义时期才真正扬眉吐气。浪漫主义作家对《堂吉珂德》可谓推崇备至。德国作家先声夺人,于1800年和1801年率先推出了两个版本,首先是施莱格尔兄弟,继而是谢林和海涅。与之遥相呼应的,当然还有英国诗人拜伦等。他们对《堂吉珂德》的高度评价,一扫笼罩在塞万提斯头上的阴霾,并奠定了塞学在西班牙乃至世界文坛的崇高地位。与此同时,西班牙本土的塞万提斯研究迅速升温,并在生平和版本研究上取得了骄人的成果。此后,现实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塞学扩展了新的维度。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马克思和恩格斯等,将塞万提斯及《堂吉珂德》研究引向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以上学术史梳理可以证明,或褒或贬,甚至大褒大贬,构成了传统

塞学的两大阵营。当然,二者之间也有打破排中律的钩沉索隐和修辞研究,如梅嫩德斯师徒的版本考据或有关学者的审美批评。20 世纪的情况有所不同。随着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各种形式主义、虚无主义批评的兴起,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历史批评受到了挤压,但意识形态批评同样强劲,尤其是在冷战时期。塞学作为文学批评的一环或一隅,变得越发的五彩斑斓,无论观点还是方法,又何啻五花八门!

因此,本著不可能也无意于评判浩瀚塞学的所有立场、观点和方法,而只想攫取其沧海之一粟,并管窥蠡测,对文学及文学经典其所以成为经典的一般规律和特殊形态发表一家之言,进而对我国当下的文学批评和创作富有借鉴意义的相关方面略陈管见。失当和谬误在所难免,敬请方家读者批评指出,以裨更正。

需要特别说明并鸣谢由衷的是,阿拉伯语学者宗笑飞拨冗为第二编第二章撰写了主体部分,北京大学、南京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语言大学的一些同行、新锐帮助翻译了塞万提斯研究资料中的一些篇什。资料部分还选用了一些前辈、同人的译作,谨此一并致谢,但为统一起见,编者对其中的个别译名、释文稍有改动。

1 绪言

1 第一编 塞万提斯学术史

3..... 第一章 17 世纪

3..... 第一节 最初的是非恩怨

5..... 第二节 滑稽的堂吉诃德

15..... 第三节 崇高的堂吉诃德

19..... 第四节 堂吉诃德在境外

23..... 第二章 18 世纪

24..... 第一节 18 世纪上半叶

26..... 第二节 18 世纪下半叶

34..... 第三节 重要版本、译本：序、跋和注疏

37..... 第四节 否定性批评

42..... 第三章 19 世纪

43..... 第一节 19 世纪上半叶

60..... 第二节 19 世纪下半叶

93..... 第四章 20 世纪

93..... 第一节 20 世纪之初

105..... 第二节 20 世纪 20 年代

115..... 第三节 20 世纪 30 年代

119..... 第四节 20 世纪 40 年代

122..... 第五节 20 世纪 50 年代

123..... 第六节 20 世纪 60 年代

127..... 第七节 20 世纪 70 年代

131..... 第八节 20 世纪 80 年代

138..... 第九节 20 世纪 90 年代

142..... 第十节 中国接受

148..... 第五章 余音缭绕

155 第二编 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

157..... 第一章 塞万提斯的矛盾和偏见

212..... 第二章 塞万提斯的反讽或戏仿

225..... 第三章 塞万提斯的虚构与真实

244..... 第四章 《堂吉珂德》:经典的偶然性与必然性

259..... 第五章 否定之否定 认识之认识

278..... 第六章 《堂吉珂德》与经典背反

287..... 第七章 《堂吉珂德》与文艺复兴运动

303 附录一 重要文献

335 附录二 人名中外文对照及索引

348 附录三 书、报、刊名中外文对照及索引

第一编

塞万提斯学术史